



# 唐史



用现代的视角 以故事说人物  
以人物说历史 以历史说人性



## 原来超有趣

以人性解史，以趣味说史。本书以现代的视角讲述唐朝将近三百年间的历史，运用立体结构梳理唐朝历史的多重形象，并试图透过分析历史事件，解开其背后所隐藏的玄机，此外本书深度挖掘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感，使读者培养开阔的文化视野，从而更好地应对人生挑战。

方寄傲 编著

全新的观点、现代的语言、诙谐的文字，真实再现大唐王朝的兴盛与没落。

解读历史人物 还原历史真相 研读历史智慧

# 唐史原来 超有趣

(第四卷)

方寄傲 编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削藩不成蚀把米

唐代的藩镇称之为“道”，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形成区别于州县的观察区，以此来保卫中央的安全。藩镇本来是不属于行政范围之内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它的长官节度使的权利越来越大，使之成为了在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自“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割据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经过了肃宗朝和代宗朝的发展，到了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状况进一步加重，各地的节度使们拥兵自重，势力非常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统治。唐德宗在即位之后，一直就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为此，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有力的就是武力削藩。

在唐中后期的藩镇中，以河北道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的势力最为强大。这三镇的节度使都和当年引发“安史之乱”的安禄山有很深的渊源，例如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就是安禄山的义子，幽州节度使李怀仙也曾经参加过安禄山的叛军。即使如此，为了安抚地方势力，在“安史之乱”后，朝廷还是不得不将这些人册封为节度使，可见唐朝到了中后期，中央的实力是如何衰微。虽然这样的做法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性，但幸运的是，自肃宗朝以来，这几个藩镇还相对太平，并没有闹出什么大的争端。

除了河北三镇外，齐鲁之地的淄青镇实力也是不容小眈。淄青节度使原本是侯希逸，但后来被他的表弟李正己所驱逐。淄青从代宗时期开始就是对抗朝廷的一股强大力量，也是当时朝廷防范的重要对象之一。但奇怪的是，唐德宗即位之后，李正己却表现出了和往常不一样的态度。他主动派出使者到都城觐见德宗皇帝，还表示愿意向皇帝进献铜钱三十万缗，以表他和淄青的将士、百姓对新君的敬仰之情。

李正己不合常理的殷勤自然引起了唐德宗和朝中大臣们的怀疑，宰相崔祐甫首先站出来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李正己进献的钱财。在崔祐甫看来，李正己只不过是想借此机会试试新登基的皇帝对藩镇的态度，可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唐德宗虽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又

害怕拒绝会惹怒李正己而引发事端。最后还是崔祐甫解决了这个尴尬，他建议德宗将这三十万赏赐给淄青的将士，这样不仅不会拂了李正己的面子，还维护了皇帝在百姓心中的仁君形象。

对李正己事件的处理展现了崔祐甫出色的处事能力，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唐德宗还在积攒实力，这么做只不过是暂时的妥协，为以后的削藩做好完全的准备。除了想尽办法安抚各地的节度使外，唐德宗还做了一件事，那便是解除了大将郭子仪和崔宁的兵权，其后又解决了一些小的叛乱，稳定住了西北地区的局面。准备工作完成得差不多之后，唐德宗就要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他心中酝酿已久的削藩大计。在他的计划中，首相要除去的就是为患已久的河北三镇。就在不久之后，改革的机会便适时地到来了。

按照朝廷以往的规定，各地的藩镇由节度使控制，节度使不仅拥有强大的地方管理权，还拥有大量的土地。节度使死后，他们的子嗣有权继承他们的职位和土地还有其他的一切特权。之所以当初有这样的规定，也许是为了安抚各地的节度使，使他们为朝廷效力并使其有所依靠，避免引发争端和叛乱。但随着藩镇势力的扩大，这样的制度便引发了许多弊端。

首先是这些节度使的职位代代相传，就使得家族势力在地方生根发芽，很多地方的百姓只知有藩镇，不知有朝廷。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节度使就不像原来那样听从朝廷的号令，自成一家，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

其次，原本从中央派到各地的节度使都是经过朝廷甚至是皇帝亲自挑选的人才，对于地方的管理和统治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批节度使陆续死去，他们的后代却并非每个都继承了祖上的才能，其中也不乏碌碌无为的庸才，这就违背了当时朝廷选派节度使驻扎地方的初衷。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正月，河北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李宝臣死后，他的儿子李惟岳秘不发丧，向朝廷上表请求继承父亲的职位。本来按照常理，这件事情很快就能得到批复，但让李惟岳吃惊的是，唐德宗一改代宗当年对藩镇姑息的政策，竟然拒绝了他的请求。朝廷坚决的态度让李惟岳大为恼火，生气的同时，他也意识到皇帝要削弱藩镇势力的决心。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李惟岳联合了山南节度使梁崇

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等各地的节度使，武力对抗朝廷。

虽然这次的叛乱范围比较大，但唐德宗应该心里早有准备。李惟岳等人发动兵变的消息传到朝廷之后，唐德宗毫不示弱，马上就将驻扎在京西的一万多兵力调到关东抵抗。为了壮大中央军的声势，他甚至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去前方征讨叛军的将士。虽然地方势力来势汹汹，但毕竟势力不敌中央政权，很快便纷纷败落下来。李惟岳最后被自己的部将王武俊杀死，李正己父子一个病死，一个被打得大败。眼见局势完全倒向中央政府，驻守在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主动向朝廷投降。

各地的削藩战争节节胜利，就在唐德宗觉得大计就要成功之时，局势陡然发生了逆转。原来唐德宗在削藩的过程中，不仅征调了中央的军队，还有一个重要途径，那就是利用藩镇的军队来攻打藩镇。这一做法不仅触犯到了各地藩镇的权益，还使得节度使们的危机感与日俱增，他们认为，李惟岳等人的今天或许就是他们的明天。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年末，驻守在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自封为天下都元帅，称建兴王，并联合卢龙节度使朱滔（称冀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四人发动叛乱。

李希烈等人这次发动的叛乱相对于前期可谓是声势浩大，战火一下便从河北蔓延到了河南。唐德宗听闻之后大吃一惊，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叛乱越来越严重，眼见东都洛阳就要落到叛军的手中了。在如此危急的局势下，唐德宗马上派大将哥舒曜率军前去征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又下旨命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原兵马前往淮西助哥舒曜平乱。但却出乎意料的是，在途经长安时这支军队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

事情的起因是朝廷没有处理好部队的后勤事宜，军队士兵们所吃的糙米和素菜根本不能使他们负荷长时间的行军作战，再加上朝廷没有赐予他们应有的赏赐，士兵们便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下发生了哗变。当时愤怒的将士们将粗糙的饭菜倒到地上，放声说道：“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革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姚令言见状马上上前劝阻，并许诺到了洛阳皇上一定会有赏赐。但已经极度失望的士兵根本不听姚令言的敷衍之词，依旧向城中冲去。

与此同时，哗变后的泾原之师拥立朱泚为帝，改元应天。朱泚是此

时正在反叛的卢龙节度使朱滔的哥哥，也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的统帅，他在称帝之后便即刻率大军围困了唐德宗的避难之所——奉天。李唐王朝的实力虽说大不如前，但在全国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皇帝在奉天被困的消息传出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人便火速率军回撤，前来奉天勤王。

奉天危机的解除也宣告着唐德宗削藩政策的失败，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他向天下人颁布了一道“罪己诏”，称这次战乱的责任都在自己。在诏书之中，他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意思是说是自己的失误最终引发了各地的叛乱，而李希烈等人都是被逼无奈，完全没有责任。最终的结果是，这些参与叛乱的藩镇和节度使全部被赦免，皇帝“一切待之如初”。王武俊等人见皇帝如此，便见好就收，马上取消了自封的王号，上表向朝廷请罪。而这次的削藩之乱就以唐德宗的完全妥协而告终。

## 猫尾巴不能踩

好景不长，就在“泾师之变”结束后的一个月之内，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联合长安的叛将朱泚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叛。那么，一向对朝廷忠心不二的李怀光为什么会为唐德宗解除了危机之后反而倒戈相击呢？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唐德宗对他的不信任，李怀光此次的叛变虽然罪不可恕，但唐德宗对此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唐德宗的性格中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猜忌心较重，并且遇事时往往不能自己作判断，总是依靠身边的大臣帮自己作决定。德宗这样的性格引发了很多事端，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他听信杨炎的一面之词而将重臣刘晏诛杀。也许是历经过乱世，也许是自小就受尽了藩镇叛乱痛苦，所以在唐德宗的内心深处一直认为武将是不可信任的，必须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控制。所以这次的危机虽然是在李怀光的帮助下才得以解除，但唐德宗却并不因此心怀感激，而是对李怀光的用心产生了怀疑。不仅如此，为了控制李怀光的势力，唐德宗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极端措施。

唐德宗对李怀光的态度除了有自己“心病”在作怪之外，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周围奸臣和小人的唆使。当初杨炎为了一己恩怨在朝中和刘晏闹得不可开交，这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为了牵制杨炎的势力，唐德宗在建中二年的二月拜卢杞为相。卢杞为人阴险毒辣，为了自己的权益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无恶不作。

但就是这样的奸臣不知为何却能得到唐德宗的信任，杨炎在世的时候尚且可以与之抗衡，但杨炎一死，卢杞就独掌大权，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卢杞之外，此时环绕在唐德宗身边还有京兆尹王翊、判度支赵赞等人。这些人终日只知逢迎主上，并不将国家大事放在心中，对朝廷和百姓的危害极大。

虽然朝廷上下有不少人都对卢杞心生不满，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李怀光却根本不买卢杞等人的账，他性格粗枝大叶，遇事不多加考虑，多凭自己的喜恶。再加上他此次为皇帝解了围，言语之中就更无所顾忌。李怀光曾多次宣称是因为朝中奸臣的专权才导致皇帝遭受战乱，逃离京师。不仅如此，他还称在奉天解围之后，要请求皇上将这些奸臣诛杀，言下之意，他回京之时就是卢杞等人覆灭之日。

卢杞等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想到的解决措施就是马上阻止李怀光面见圣上。卢杞说：“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矣。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意为收复长安迫在眉睫，如果李怀光前来奉天则会耽误了大事，于社稷和百姓无益。

唐德宗本就十分信任卢杞，如今卢杞如此为国家考虑，唐德宗更是不疑有他。于是，唐德宗改变了主意，马上下旨命李怀光率军火速与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渭北节度使李建徽以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会合，马上收复长安，不必先来奉天。

皇帝的态度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李怀光当然知道是卢杞等人从中挑唆。这件事之后，李怀光对卢杞的恨意日渐增加，他多次向唐德宗进言，称卢杞等人蒙蔽主上，祸国殃民。在李怀光的坚持下，朝中许多人也纷纷表示出对卢杞的不满，一时间舆论哗然。眼看局面难以控制，唐德宗为平众怒，只得下旨将卢杞贬为新州司马，其余等人也都被贬黜到外地。

李怀光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事后他又十分担心。他深知皇帝贬斥卢杞等人不是出于自愿，害怕事后唐德宗会加罪于他，所以他便开始为自己谋划退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怀光对唐王朝产生了反叛之心。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李怀光与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合军，驻扎于咸阳以西的陈涛斜。为了使这些武将们相互节制，德宗封李怀光为都统，命他率部火速收复长安。但此时的李怀光此时却在暗中和朱泚谋划，准备和他一起瓜分大唐的天下，所以总是以兵马疲惫为理由迟迟不肯发兵。李晟见李怀光如此，心中已对其心也略知一二。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马上上书请求将自己的部队和李怀光分开，移驻于东渭桥。

李怀光所做的一切都表明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逐渐感觉到危机的唐德宗也秘密地加强了奉天的戒备。此时李怀光的部将赵升鸾向浑瑊密报，说李怀光准备火烧乾陵，挟持唐德宗。李怀光手下兵力强大，此时若是一味抵抗无异于是以卵击石，无奈之下的唐德宗只得又一次逃到了梁州（今陕西汉中）。

李怀光虽然来势汹汹，但他的谋反行为在军中却得不到支持。唐德宗出逃之后，李怀光马上命手下将领前去追赶，但孙福达等人却故意拖延时间，最后无功而返。其后李怀光又下令进攻李晟，但军中将士不听话者占多数。就在此时，本来以兄弟互称的朱泚也改变了态度，先前他们约定共同称帝，但此时朱泚却给李怀光颁下诏书，与他君臣相称。一时间，李怀光众叛亲离，进退两难。无奈之下，他只得率领兵马东去，希望能够积攒实力，日后再图进取。

兴元元年七月，李晟率军光复了长安，唐德宗得以返回长安。朱泚虽败，但李怀光的兵马还在河中盘踞。到了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的秋天，马燧才率军收复了河中，李怀光也自尽而亡。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李希烈被其部将陈仙奇杀死，淮西被收复。直到此时，这场藩镇之乱才算告一个段落。尽管如此，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依旧没有得到控制，在唐德宗之后，唐王朝的君主们依旧要承担接连不断的藩镇危机。

德宗年间的削藩之举之所以未能成功，这其中有唐德宗个人的原因，但也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唐德宗本人来看，以武力手段来削藩一开始就过于极端，势必会引起节度使们的反感。但



从相反的角度来思考，如果唐德宗的手段柔和一些，是不是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呢？

纵观唐朝的历史，在德宗之前，成功控制藩镇势力膨胀的例子不在少数，唐太宗在贞观年间的做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年唐太宗为了削弱地方的势力，将继承祖上爵位的子弟们降级，无疑不是一种柔和削藩的手法。但德宗时期的状况毕竟不能和唐初相比，两个时期藩镇问题所引发的弊端大小也不能同日而语。如果此时的德宗不采取强硬的手段，藩镇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愈来愈严重。

所以说，唐德宗武力削藩的手段虽然有些极端，但却不失为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唐德宗没有预料到的是，此时藩镇的军事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而且这些节度使往往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到一起，共同对抗朝廷。这是历史发展到此时必然会出现的状况，并不是唐德宗的个人能力能够解决的。

武力削藩的政策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加剧，也正是因为削藩之事，唐德宗经历了两次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这不得不说是作为一个帝王的悲哀。这些经历都让唐德宗的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改变。在这之后，他再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而开始对藩镇一味姑息，他的这种消极的态度使得当时的局面和优势丧失殆尽，使自己完全陷入了被动。随着时间的发展，藩镇问题愈加积重难返，也给后期的藩镇叛乱埋下了沉重的隐患。

## 第二章 永贞革新， 乌云正在逼近

### 瘫痪也不能阻挡登基的脚步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 年），唐德宗李适薨逝，享年六十四岁。死后葬于崇陵，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唐德宗在位共二十六年，是唐朝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之一。

纵观唐德宗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位充满着悲剧色彩的皇帝，他的前半生为了改革而励精图治，唯一的理想便是在自己在位期间内使唐朝恢复以往的盛世气象。这位果敢的皇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不幸的是都收效甚微。

“安史之乱”后，唐朝在各方面都积重难返，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是历史发展的局限，也是人力不可能轻易变更的。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处在时代洪流中唐德宗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纵使他明白也无法改变现实。政治上的挫折使得这位曾经雄心壮志的皇帝逐渐变得力不从心，于是他的锐意改革之心也在晚年逐渐消失殆尽。晚年的他宠幸宦官，好敛钱财，所以得到的评价不过是“失败”二字。可以说，德宗时期的改革失败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悲剧，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唐德宗死后，继承他皇位的是皇太子李诵。据史料记载，唐德宗共有十一个儿子，其中舒王李谊和文敬太子李諲并非唐德宗所生，所以实际上德宗的儿子共有九个。

舒王李谊本是郑王李邕的儿子，也是唐代宗的孙子。郑王去世得早，所以李谊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德宗看李谊孤苦，就将他收做自己的儿子，因为当时德宗还没有子嗣，所以李谊在名义上就是长子。

至于文敬太子李諲则是李诵的儿子，从血缘关系上来说他是德宗的孙子，但因德宗特别钟爱于他，所以也当作自己的儿子。除了李谊和李諲外，在剩下的九个儿子中，宣王李诵为其长子，生于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正月。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六月，李诵被册封为宣王，德宗登基后的一年内又以长子的身份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唐的储君。

本来皇长子继承皇位时完全符合“嫡长制”的继承传统的，但唐顺宗这个皇位却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唐德宗在位时间较长，所以李诵前前后后做了二十六年的太子。建中元年他被册封时是十九岁，到了贞元二十一年即位时，顺宗已经四十四岁了，这在历朝历代即位的新君中也算得上一个特例了。

在史书的记载中，顺宗李诵是个“慈孝宽大，仁而善断”之人。他在当太子的时候爱好学习各种技能，对书法尤为钟爱，写得一手好字。每当唐德宗赐予臣下诗作时，几乎都是让太子执笔的。李诵不仅精通文墨，更为可贵的是他武艺出众且勇气过人，当年的奉天保卫战就有他的一份功劳。建中四年，长安暴发了“泾师之变”，唐德宗仓皇的向奉天逃窜，负责断后的就是太子李诵。

后来奉天告急，也是他身先士卒，率领将士们守城抗敌。就在奉天即将失陷之时，李诵亲自到城门上督战，还为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因为李诵的努力，军心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将士们无不奋勇抵抗，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李诵在其二十六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可贵的就是为人不张扬，事事都小心谨慎。但纵使他再小心，皇位这个巨大的诱惑还是使很多人想尽办法来陷害他，目的就是取而代之。在这些事件中，尤以发生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八月的郾国大长公主之狱影响最大。

郾国公主是唐肃宗的女儿，所嫁的驸马名叫裴徽，因为裴徽早死，后又嫁给萧升。郾国公主与有萧升一个女儿，因为和李诵年纪相当，就亲上加亲，许给李诵做了太子妃。因为是当朝公主，又是太子的岳母，郾国公主经常无所顾忌地出入东宫，并和当时的太子詹事李昇等人交

往甚密。驸马萧升去世得早，郃国公主两度丧夫，心情十分沮丧。可能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她居然和彭州司马李万等人私通。这件事的确是皇室的一大丑闻，但就是有一些小人无端生事，将这件事情牵扯到了皇太子的身上。

晚年的德宗对宦官极其宠信，但太子却十分看不惯这些仗着权势嚣张跋扈的宦官，对他们从来没有好脸色。这些宦官在宫中多年，深知皇室的规矩，现在太子这般厌恶他们，等到太子继承了皇位，他们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为了保证自己的未来，这些宦官秘密商议想要让德宗另立储君。正当他们苦于没有借口的时候，发生了郃国公主之事。这些人不但向皇帝告发了郃国公主的“淫乱”，还称她在宫中行“巫蛊之术”。“巫蛊”在皇室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历朝历代宫廷之人只要沾上了“巫蛊”的嫌疑，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德宗听闻这件事之后大为震惊，马上召太子前来问话。李诵自然知道父亲召他前来所谓何事，为了洗刷自己的冤屈，他主动请求废除自己的太子妃萧氏。这件事虽然是子虚乌有，但却使得德宗父子之间产生了隔阂，自此之后，德宗便动了废除太子，改立舒王为嗣的心思。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德宗召来了宰相李泌前来商议。

李泌是三朝元老，在德宗面前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听了德宗想改立子嗣的想法后，李泌坚持认为此事不妥。不仅如此，他还举了太子废立所引发祸端的例子来劝谏皇帝，最终使德宗打消了这个念头。经历了郃国公主一事之后，李诵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之前他还敢于表达自己的政见，但这件事后凡事都不敢顶撞父亲。

和其他的皇子不一样，李诵到了德宗后期便患有严重的疾病，身体状况一直很不好，根本不能承担繁重的政务。据《旧唐书·顺宗本纪》记载，唐德宗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就患上了中风，到了后来甚至到了不能说话，不能行走的地步。

到了德宗病危的时候，诸位皇子都在父亲身边侍奉汤药，唯独太子李诵因为身体有病不能前来。而德宗在临死之前因为想见太子而不得见，涕咽久之。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皇帝去世时太子不在身边，所以朝中就皇位的继承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争执。关于此时的帝位之争，《资治通鉴》中有如下记载：

“（正月）癸巳，德宗崩；苍猝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至金銮殿

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疾，地居糖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纲等从而和之，议始定。次公，河东人也。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粗安。”

可见当时反对李诵，拥立广陵王李纯的应该就是以刘贞亮为首的宦官集团。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保住自身的利益。

李诵此时虽然卧病在床，但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他拖着病体召见了禁军的首领们。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朝廷公布了立太子李诵为新君的遗诏。

两天之后，李诵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改元永贞，是为唐顺宗。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有很多将士怀疑即位的人到底是不是太子，等到他们亲眼目睹唐顺宗登上皇位时，才喜极而泣地说道：“那真是太子！”从这些卫士的表现也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李诵在当时还是颇得人心的，只是因为他因为自身的疾病，在即位的关键时刻没能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中，从而才造成了恐慌，也给了宦官们一个可乘之机。好在顺宗终于继承了皇位，那么朝廷上下的疑虑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

## 天黑请闭嘴

和父亲唐德宗一样，唐顺宗李诵也是一个饱受过战争之苦的皇帝。正是因为如此，年轻时的他就下定决心做一个圣贤的君主，成就一番大事业，为天下苍生造福。因为李诵宅心仁厚且又胸怀大志，所以在他还是太子之时身边就环绕着很多有识之士。这些东宫官员时常和李诵探讨国家大事，是李诵在政治上不可或缺的支柱。而在众多的东宫官员中，尤以王叔文最得李诵信任，可以称得上是东宫集团的核心人物。

“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时贤，驰声溢四塞”，出于对朝政和民间疾苦关心，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政治抱负，德宗时期，大批南方的有识之士跋涉到长安，而王叔文就是其中之一。

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人，因为棋艺精湛而被德宗皇帝选中，担任东宫待诏一职。王叔文虽然是因棋艺发迹，但其擅长的还有为政之道。自进

入东宫的那一天开始，王叔文就忠心不二地陪伴在李诵的身边，为李诵出谋划策。李诵的太子之位，在德宗末年之所以能够保全，主要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前文所提到的宰相李泌，另一个就是王叔文。

太子宫坐落在宫城以东，所以通常被称为“东宫”，是皇太子生活起居之所。按照封建王朝的传统，皇帝一般都会给储君配备一些官员，这些人负责教导和帮扶太子，使之熟悉政治并加强其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为日后成为一国之君做好充足的准备。

众所周知，皇帝和太子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他们虽为父子，但又是君臣。皇帝一方面希望自己的接班人能够在各个方面能够超越他，成为让世人敬仰的君主，另一方面又害怕储君功高盖主，借机篡夺皇位。正是因为这微妙的关系和地位，历朝历代的东宫都是个多事之地，在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父子、兄弟相残的惨剧。所以不论是东宫的官员还是它的主人皇太子，处事都需万分小心，一不小心就会面临着杀身之祸。

唐顺宗李诵二十六年的太子生涯可以粗略地化为两个部分，其断点就是“郾国公主之乱”。从他的表现和处事态度来看，之前的李诵在政治上还是较为主动的，遇事也敢于向君主进谏因而得到了韩愈“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的评价。例如当年唐德宗十分宠信裴延龄和韦渠牟，想任用他们为相，但李诵早就听说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才华且在外声誉不佳，所以便找准机会力劝唐德宗。正是因为李诵的努力，裴、韦二人一直没有得到重用。

又有一次，唐德宗在鱼藻宫大摆筵席，命宫女们在彩船上戏水游玩，齐唱船歌，又名乐官大奏乐曲，好不热闹。唐德宗十分欢乐，兴致勃勃地问一旁的太子：“几天宴会如何啊？”李诵没有多言，只是说了一句“好乐无荒”。这句话语出《诗经》，意为劝谏人不要沉湎于享乐。

李诵的所作所为虽然得到众人的称赞，但身为师傅的王叔文却颇为担心，如果太子锋芒过露，一定会引起小人的嫉恨。再加上唐德宗到了晚年猜忌心很重，对太子并没有之前那么信任，更有不少人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所以眼下最为要紧的是“韬光养晦”，用低调的态度来保住自己的地位。王叔文虽然想到了这一点，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来劝说太子。也是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宦官们引发的宫市弊政，李诵才明白了王叔文的一片良苦用心。

唐德宗晚年好敛钱财，所以大量地任用宦官。这些宦官打着皇上的旗号贪污腐化，流毒甚广，造成了当时著名的“宫市之弊”。因为宦官们深得皇帝的信任，所以御史和谏官们也是敢怒不敢言。这天，李诵和东宫官员们谈到这件事，可谓是群情激奋。

李诵见众人都义愤填膺，但却惧怕威势不敢进谏，便有意担起责任，请求德宗革除这一弊端。众人见太子如此为国为民着想，纷纷称赞他贤德，只有王叔文一人坐在旁边默默不语。等到众人都散去之后，李诵特意将王叔文留下，询问他刚才为何一言不发。

王叔文对李诵说道：“微臣蒙太子信任，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请问太子，身为国之储君应当以什么为重呢？”李诵不解其意，王叔文又接着说：“太子侍奉皇上，关心的应该是皇上的饮食起居，他事又何必过问呢？如今陛下在位已久，倘若有小人从中挑唆，怀疑太子以此来收买人心，您又如何向皇上解释呢？”

听了王叔文的一番话，李诵恍然大悟。之前“郾国公主”一事就是因为他得罪了宦官，如果这次再出面建议罢除宫市，等于就是公开和宦官宣战了。想到这里，李诵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对王叔文说：“如果不是先生提醒，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险些铸成大错啊。”

自此之后，李诵就奉行王叔文所教导的“韬光养晦”之术，在东宫闭门休养，尽量不参与政事，以免给人以把柄。也是因为这件事，李诵对王叔文愈发地敬重，将他引为心腹，事无巨细都与他商议。为了报答太子对自己的信任，王叔文为其详细地分析了朝中的势力发展，并建议他即位之后对朝政作出一番新的改革。

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后，王叔文便开始了实际行动，确切地说就是为太子网罗人才，为将来做准备。王叔文暗中结交了大批在当时大有前途的人士，并经常向李诵推荐何人可以为相，何人可以为将。不仅如此，他还有意结交了许多军事将领，希望这些人能在关键时刻力保太子。

在王叔文的努力下，李诵身边很快就集结了许多才德兼备之人，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等人都在其列。这些人多是年轻的文人，平均年龄不超过三十岁，官职不高，所以并不引人注目。他们以“二王”（王叔文和王伾）为核心，经常在一起讨论时政，结成了生死之交，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努力。

在东宫集团中，较为有名的除了王叔文和王伾，就要数刘禹锡和柳

宗元了。这二人在文坛上颇负盛名，在政治上也是顺宗朝不可忽视的人物。

韦执谊是德宗时的翰林学士，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就聪敏过人。年纪轻轻的他因为才华横溢深受唐德宗的喜爱。唐德宗喜欢诗歌，韦执谊便常常陪侍左右，与之唱和。韦执谊在德宗朝后期的地位是较高的，作为皇帝的亲信，他可以自由地出入皇宫。一次恰逢德宗的寿辰，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官僚贵族都要向皇帝进献贺礼，而作为皇太子的李诵当然也不例外。李诵自青年时期就喜好佛学且颇有建树，而这次他进献给父皇的礼物便是一尊佛像。收到佛像的唐德宗很是高兴，马上命韦执谊为之作了一篇赞词。

这篇赞词文辞优美，德宗于是下旨皇太子赐缣帛给韦执谊表示谢意。按照惯例，接受答谢的韦执谊来到东宫谢恩。韦执谊虽然是德宗的宠臣，但却和裴延龄、韦渠牟二人不同，很受太子的倚重。趁此机会，李诵郑重其事地对韦执谊说：“学士你对王叔文熟悉吗？他的确是个有才之人啊。”而对于韦执谊，王叔文也是耳闻已久，二人相见恨晚，自此之后关系日益密切。作为东宫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韦执谊后来也是官至宰相。

除了拥有韦执谊这样的天子近臣，东宫还结交了宫中的宦官李忠言。这些人在李诵最困难的时期陪伴和扶持着他，如果没有他们，在德宗病重的那段时间里，身患重病的李诵很可能就与皇位失之交臂。

李诵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九月患上了严重的风疾，面容扭曲，口不能言。不久之后，唐德宗也因为年老多病而卧床不起。因为两宫都身患重病，不能互通消息，朝中也因此产生了恐慌。就在德宗生病的这段时期内，是王叔文陪伴在李诵的身边，为他传递消息。李诵虽然不能说话，但看着师傅的一言一行，对朝中大事的发展也有了大概的了解。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见李诵病重，并以此为借口，想立舒王李谊为帝。

德宗薨逝之时，俱文珍等人秘不发丧，准备谋取李诵的皇位。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是王伾和宦官李忠言偷偷地将这个消息告知了王叔文，让他们早做准备。得到消息后的王叔文马上找来了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商议对策，也是他们想尽办法取得了朝中大臣的支持，最终击败了俱文珍等图谋不轨的宦官，保住了李诵的皇位。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李诵克服了种种困难，拖着病体在太



极殿即位。自此，东宫众人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顺宗登基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即将拉开帷幕，那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而王叔文等人也终将走上历史的舞台，创造出属于他们的时代。

## 新皇帝，新风尚

唐顺宗的病情并没有因为即位之事的顺利进行而好转，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中风越来越严重，面目扭曲，身体不能动弹，只能靠点头和摇头来处理政务。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二日，新即位的唐顺宗第一次召见了百官，大臣们见皇上病体如此，也没有人敢当面奏事。既然皇帝不能理政，那么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原来的东宫集团的手中。对于王叔文和王伾等人来说，一展抱负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顺宗即位，王叔文等人得到重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此时王叔文等人却要面对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职务，也就是官衔。因为资历不够，恐不能服众，王叔文和王伾只能担任翰林学士和翰林待诏的职位。虽然职位上不是宰相，但所有的实权都是掌握在王叔文手中的，所以说此时的王叔文是以翰林之名担宰相之职。

顺宗朝这种这种官位和实权不相等同的现象或许在历朝历代的历史上都是极其少见的，这种尴尬的身份不仅使王叔文等人无所适从，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他们与重病皇帝的直接交流。关于此时朝中的情况，《资治通鉴》、《旧唐书》、《顺宗实录》等史籍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时顺宗失音，不能决事，常居宫中施帘帷，独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渐，王伾先入，称诏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辛亥，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己用事于中，与相唱和。”

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身为手握实权的官员，王叔文却因为官职低下，奏事都要通过王伾，极为不便。为了防止大权旁落，王叔文推荐韦执谊为相。韦执谊出身望族，在前朝又颇受德宗宠爱，论资历论声望